

# 苦难的历程

安毅夫 著



# 苦难的历程



安毅夫 著

---

书 名：苦难的历程

作 者：安毅夫

规 格：170毫米 × 240毫米 16开本

版 次：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安毅夫简历

原籍贵州省郎岱县舜卿乡（今六枝特区牛场乡），彝族。1923年11月20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市。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，在杭州、上海工厂工作。1947年12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在上海、南京、贵阳（中共贵阳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）、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其后，到广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支队。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进广州，任军代表接管工厂，任华南财经委员会秘书，进中共华南分局党校学习，任广东省兴宁县土改工作团的乡、区工作队队长。1951年3月调成都西南民族学院，先后任干训班班主任、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。1958年被诬陷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关押、劳改20年。1979年4月平反，在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工作。1981年3月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。1989年3月后改任贵州民族学院名誉院长直到1998年离休。此外，曾任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、《贵州通史》编委会副主任、贵州省彝学会会长等职，并被选为第六、七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

# 前 言

我这生的经历比较曲折，可谓酸、甜、苦、辣尽皆备嚼。家人和朋友多次劝我把它们记下来，写成自传，或许对后人有点用处。我也想写，倒不是因为我的经历带有某些传奇性，主要是，我这一生适逢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，这中国翻天覆地大变革，祖国人民苦苦挣扎，灾难重重的时代，我从政治上参与了。我的自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的进程。

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怀有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社会责任感。同时，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背负荆棘，许多人步履艰难越起前行，不少人倒毙途程。当然，也有那么一些人飞黄腾达，可是分析起来，其中却不乏历史的罪人和卑鄙小人。国家、民族、人民只成了他们贪婪攫取，图谋私利的幌子，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普世真理更被他们廉价利用后抛弃、践踏。

读大学时，我曾看过阿·托尔斯泰的《苦难的历程》，描写俄国十月革命时一个知识青年在革命道路上的苦难经历。没想到我的路也走得十分艰难，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。我的自传也命名为《苦难的历程》吧！

这本自传只是我一生经历的一个简要的概况，对事件、人物和内心活动均较少描述，较多篇幅涉及政治方面。这是自然的。在我一生的几十年里，政治风云笼罩着中国大地。中国人，即使是终身耕耘的农民都不由自主地卷入政治斗争，何况我还是自觉自愿地参与，且又不知不觉地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，几乎遭到灭顶之灾。

起心写自传也有几年了，总下不了决心。谁看呢？这些陈年旧事还有多少人关心？我也并不打算出版、发行，就作为留给我朋友们的一点纪念和子孙们的一点遗产吧！

这本自传从出生写到1979年我平反恢复工作为止，迄今又过去25年了。这25年当然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阶段，我在贵州民族学院当院长，真心实意、勤勤恳恳，努力工作的8年。而在这之后，却是我“理想”幻灭，“梦想”复归的时期，应该有许多可写的。写不写？何时写？我不知道。

2004年8月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--

第一章 身陷囹圄	1
第二章 童年时代	11
第三章 八年抗战	25
第四章 投身革命	49
第五章 战斗犹酣	69
第六章 八载成都	89
第七章 铁窗十年	103
第八章 苦役十载	127
第九章 复出复归	145
附记	157
后记	165
读后感	166



— 第一章 —

身陷囹圄





“起来！”“快！”的嚎叫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。还在迷迷糊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阵猛烈的踢门，再次的怒吼，使我完全清醒了。正在穿衣服，“快点！磨什么？”的吆喝声又响了起来。抬头看看小风门①，只见一双圆的大眼睛凶狠地盯着我。急急忙忙穿好衣服，我站了起来。“折好被子！”一声毋庸置疑的命令，我忙把被子折好。“坐下！”再一次传来了命令，我坐在了被子上。“不准坐在被子上！”我只好席地而坐了。“好好反省！”啪哒一声，关上了风门。睡了一夜，该起来活动一下，刚起身走了两步，风门又打开了。“坐下！不准走动！”又一声吼了起来。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和侮辱人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我大声喊了起来：“为什么关押我？”门打开，进来了一位身着蓝色民警大衣，身体粗壮，年在四十开外，凶神恶煞的看守。“你还要咋呼！”锃亮的手拷就拷在了我双手上。“为什么要关你？你是个罪犯！”一推，又把我推坐在地上。“再咋呼，我给你加上脚镣”。说完，关上门走了。我只好颓然长叹，默默无语。

这就是我到贵州省公安厅看守所第一天清晨享受到的“礼遇”。犯人？我犯了什么罪？十几年来，我奋不顾身，不怕国民党的追捕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。结果，结果，我却成了自己亲身参与建立的政权的敌人。……突然，心脏像割裂般地疼痛难当，一阵又一阵，我忍不住捂着心，弯腰呻吟。

“心如刀割！”这次竟亲身体验到了。“相信党！”“我是无罪的！”“相信一切会澄清的，党没有必要，也决不会冤枉我的。”我反复在心底默念。——事实上，正是这信念支持我度过了此后漫长的二十年岁月。

“人在被证明有罪前是无辜的”，这应该是毫无异议的准则。但不幸，这里却不是这样。被关押在看守所内的全叫“未决犯”。既然未决定，为什么又叫“犯人”呢？而且，比之我后来成了“已决”的劳改犯，“未决犯”的境遇更加糟糕。这道理，我不知怎样解释。但当时，对我是用不着解释的，斥责和手铐就够了。还有，监规究竟是哪几条？号子②里没有，也没有谁宣布过，一切监规都是在看守的擅自决定，在斥责和手铐中让我“亲身体验”到的。

这是间约三公尺长、两公尺宽的小号子。四堵白石灰粉刷的墙壁紧紧地箍住这狭小的空间，使人感到窒息和压抑。与门相对的一面是一扇装有铁条和毛玻璃的窗子，乳白色的微弱光线透进室内，却看不见窗外的景色。窗子上面，紧靠着天花板是一扇也装上铁条的狭长的没有玻璃的气窗，冬日的冷风阵阵吹进来，寒冷和阴暗笼罩着全室。室内除了一个木马桶和一大一小两个方木盆外，只有我的被褥和我自己了。环顾四周，想到天下之大，却只容我有这么狭小的一点空间……，心里又一次刀割似的疼痛起来。

我是1958年12月29日被捕的。

1957年6月开始反右运动。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总路线、大跃进，并提出了“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、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”的论断；随后展开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全民大炼钢铁。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，浮夸风和共产风越演越烈。左的阴影笼罩着神州大地。

学校也停课了。运动场上架起一座座土炉，白天我们大炼钢铁，晚上则集体学习。我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也不例外。12月29日晚上约8点钟左右，我正在院办公大楼四楼教研室参加集体



## 苦难的历程

学习。有人来叫我，说是有事要我到党委办公室去，于是我随同下到二楼。一进党委办公室就看到一种紧张的气氛：七、八个人神情严肃地贴墙站着，双眼狠狠地盯着我。突然，一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把枪口对着我说：“你被捕了！”我吃惊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进去就知道”！这是他的回答。“签字”！一张逮捕证放在我面前。环顾室内的人，全是本院党办和保卫科的一般干部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，要问也找不到人问。心想，我又没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又想，大概发生了什么误会，进去后说清楚就会放我的。枪口对着胸膛，一再厉声地催促，我签了名。立即，我的双手被手铐反扣在身后，推着我到了离办公大楼二百多米路程的家里。看见我被押进家来，妈妈满脸惊讶的神色，喃喃地说：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巍巍巅巅地走近我身旁，却被那位公安人员挡住。四岁的小华从来是个活泼大方的姑娘，翘着两个小辫子，一蹦一跳地围着人们叫叔叔、阿姨。小钢还只两岁多，穿着开裆裤，跟在姐姐后面又跑又叫。我的心像压上一块铅板样地沉重，但是担心妈妈受不了，不愿流露出痛苦。这时一位本院保卫干事把手铐打开，再铐在身前。小华看见了，问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？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充满双眼，只好对她说：“爸爸有事要出去些日子，好好带弟弟，乖乖地听奶奶的话。”又尽量平静地安慰妈妈，也是说大概发生了什么误会，顶多两个月就会回来的。谁知道，这一去竟是漫长的二十年！

翻箱倒柜，把所有的笔记本、像片和信件都搜走，折腾了一个多钟头，把我押上了停在家门口的一辆吉普车上。临开车前回头望了一眼，妈妈正一手牵着一个孩子，痛苦地、无言地望着我。这形

象一直深印在我心中。在看守所十年和劳改队里的十年里，无数次地在睡梦中重现，有时又换成是逸云牵着孩子们，却都是憔悴、无神、痛苦和褴褛，而每次我都揪心疼痛地从睡梦中惊醒。

逸云在1957年夏天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1958年初就被送到西昌市农村强迫劳动去了。自她被打成“右派”的一年半来，我也历经了屈辱和痛苦，现在，意想不到的，更加沉重的打击降临了。可怜的妈妈，二十年后我才知道，我被捕后第三天，妈妈和两个孩子就被赶出了西南民族学院，丢弃了零星的杂物和我十分珍爱的书籍，投奔到贵阳姐姐和妹妹处安身。一想到妈妈，我就无比的内疚。我曾太多次给妈妈带来过不安和痛苦，而这次却是深沉的、长期的痛苦。

汽车在成都街上奔驰，在一扇铁门里下了车。高围墙的一个水泥院坝里，灯光刺眼的明亮。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出房门，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：“站好！什么样子。”其实，我是站好的，只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。“你聋了？站好！”双眼凶狠地瞪着我。我想大概是我这个稍息式的姿势不对，只好赶忙立正。押送我的公安人员对他说了几句话，我被解开手铐，收去皮带、鞋带后送进了一间牢房。这时已近午夜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一间小房里十几个人并排躺着。这位干部用脚把左右的人踢开，让出一个缝隙，和着衣，我侧身挤了下去。虽然是冬天，我又没有被子，屋角马桶喷出刺鼻的臭味，连翻身也不可能，我居然倒头就酣睡了。这一夜的打击把我打懵了？心中无冷病，不怕吃西瓜？我也说不清楚。直至“起来！”“起来！”的叫嚷声把我吵醒，这已是第二天清晨了。

原来这里是成都市公安局看守所。长廊两侧是粗木棒的栅栏，



间隔着面对面的十几间牢房。白天，牢门都是打开的。有时把大家——约一百多人叫到院子里开斗争会。干部坐在藤椅上，犯人围成一圈坐在地上，“不认罪”的某人则站在中间。干部提问，大家叫嚷，这位某人则回答。不管回答什么，总是“不老实”、“好好反省”，“老实交待”，结束。更多的时候是在各自牢房里剥花生，还展开各牢房间的竞赛。每间牢房都有一位组长，是已判刑劳改的罪犯，他们就是以当“未决犯”的组长服刑的。我们这组的组长姓王，很积极，剥花生竞赛中，大声叫嚷，卖力鼓动。从以后接触的一些劳改犯来说，这位王组长算是态度和蔼的，看我吃不下饭，闷闷不乐，还劝我多吃点，安慰我说：“交待清了，到劳改队就好过了”。

第四天傍晚，我被叫了出来，带上被捕后第二天妈妈送来的被褥、衣服，没让我见到妈妈。扣上手铐，在一位揸了支冲锋枪的公安人员押解下，乘上吉普车到达火车站，上了去重庆的火车。在汽车里，这位高大粗壮的公安对我说：“押送你去贵阳，路上要老老实实。”我想，去贵阳，大概是怀疑我解放前在贵州读大学和从事地下工作时有问题吧，因此答道：“放心！我是被误会了，正想去贵阳把问题搞清楚。”此人倒好，严肃得很少讲话，可也不挑剔，没多给我苦吃。

一路上，我直担心碰上熟人，自尊心在严重地折磨着我。“看！这不是安毅夫吗？他成了罪犯。”要是听到这句话，我会无地自容的。于是，把双手连同手铐，一起笼在袖子里，尽可能不让人看出我是个“罪犯”。

在火车摇晃中，伏在茶几上，我又睡着了。抵达重庆火车站，

天已大亮，我只好露出双手，扛上行李卷，在那位“警卫员”押解下走出火车站，坐缆车上两路口，乘无轨电车到达江边，再转轮渡过长江。滚滚江水呜咽着向东逝去，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，置身在嘈杂的人群中，我突然感到无比的孤寂。我不能和他们一样地欢乐谈笑，也无心欣赏山城美丽的风光，我只能低着头，默默地斜倚在行李包上，听着江轮凄厉地笛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……妈妈和孩子们现在在做什么？可怜的妻子，啊！真不幸，她从未在农村生活过，而被下放强迫劳动的地方，偏偏叫了一个令人伤心的鬼名字：黄联（与黄连同音）乡，够她吃苦了！而我，作为一个儿子、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，我竟不但不能保护、关照他们，相反，却成了个被迫离家，押解途中的“犯人”。涌上眼眶的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也让我立即回到现实，强忍住眼泪，在轮船嘶哑的哀鸣中，走上了南岸。

“警卫员”叫来两部黄包车，我在前，他在后，到达南岸看守所。在一间号子里，一个老头已先关在里面。他问：“你是保长吧？逃跑了许多年还是给抓到了。”我只好嗯了一声。拿来了几个红苕，算是吃了一顿饭。下午五点钟，开饭了。所有人（六、七十个）都集合到院子里，八人一围。抬来个大木桶，一眼望去是一桶黄水。一个人负责打“饭”，在每人面前的大碗里挨个舀上一勺。头三轮，全是汤水，第四碗有点红苕，第五碗多点红苕。吃完，汤是胀饱了，肚子可还是饿的。老头告诉我，他来了三天，一天两餐都是这样。怪不得关押着的那些人都是面黄肌瘦的。我吃了两餐已受不了啦，再多几天怎么过呢？老头对我说：“这是存心要犯人早点交待。”天呀！用饥饿来逼人交待，这是谁的一大发明？关押的



人群中有十几个年轻女子。老头告诉我，她们是“王元”。经解释，才知道是妓女。“解放后还有妓女？”我惊讶地问了一句。

“多的是。你是个书呆子？”老头反倒惊讶了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“警卫员”来了，扣上手铐，扛上行李，又坐上黄包车，到达海棠溪，在一个小饭摊前坐下。在成都市看守所虽然是稀饭，却尽饱吃的，可心情不好，吃不下，昨天一天的红苕汤可把我饿坏了。捧着热气腾腾的冒儿头③，狼吞虎咽地几下就报销了一碗，再添了半碗，肚子里实在了，真是太好吃了！忍不住伸出舌头舔着嘴唇，走上了海棠溪的大街。

海棠溪是川黔公路的起点，这地方我曾多次来过。从江边倾斜而上的公路上，挤满了要过江的或已过江的行人，行色匆匆，忙着赶船或赶车。客车、货车和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出震耳的笛鸣冲入拥挤的人群，也争着赶船或赶路。公路两旁的店铺和小摊响着敲锅和叫卖的声音，喷出令人垂涎的香味。这就是海棠溪，是我记忆中的海棠溪。但是，这天早晨的海棠溪却是这般的冷清。寥寥的几个饭铺和饭摊，寥寥的少许行人，连汽车也少了。天府之国的成都市区里，这几年也是店铺关门歇业，很多商品不见了，鸡蛋、糖果甚至卫生纸都难买到。想不到重庆市也同样的萧条。

长途公共汽车开动了。我双手带着手铐揣在短棉大衣袖子里，端坐车中，旁边是我的“警卫员”抱枪而坐，真是衣锦还乡了。到了一品场，车子正巧又停在解放前检查站的地方。十年前，我是中共贵阳特别支部负责人，为躲开特务追捕，从贵阳坐汽车到重庆。一品场的这个隘口设了一个检查站，由国民党军警特务把守。贵阳的特务正在追拿我，一品场的这一关过得去吗？终于安全通过，但



却是提心吊胆的。十年一别，检查站仿佛依旧，我的心情却大相径庭。一点也不用提心吊胆了，因为已经用不着担心被捕，而是实实在在已经被捕了。所不同的只是，前者是国民党特务，这次却是“自己人”。

晚上，在桐梓县松坎区公所住了一宿。这是个简陋的拘留室。“警卫员”很客气地对我说：“这个房子不牢实，按规定，我得用绳子把你捆起来。”“请便吧！”我回答道。于是，双手反扣在身后，双手、双臂连带脖子用一根绳子缠住。后来知道的术语，这叫“小青龙爬背”。说他客气也真客气，捆得松松的，咽喉、手腕都不疼痛。俯身倒在草堆上，很快我就睡着了。半夜，他把我叫醒，又客气地对我说“看你老实，不好睡，解了绳子吧！”我睡意正浓，也很客气地对他说：“不必了，谢谢你！”闭上眼睛又美美地酣睡了。倒是“警卫员”辛苦了，找了把椅子，在我门口坐了一宵。第二天，他好像过意不去，午餐时单独为我要了一碗红烧肉，一盘回锅肉和一碗酸辣汤。我是连汤带水，再加三碗米饭全部装入肚皮。又辣又咸，十分可口。其滋味之美，萦迴脑际，常让我留连在此后漫长的、饥饿的年代里，直到二十年后。

可能是途中发生的一桩事使他对我另眼相看。这天上午车行途中，一位衣衫褴褛、披发垢面的农民歪歪倒倒地行走在公路中间，不管驾驶员怎么按喇叭，他就是不让。我想，这不是个聋子就是个白痴。驾驶员停下车，走向前去，一记耳光把这位农民打倒在地下，嘴里还妈呀娘呀地骂。突然。我忍不住了。朝着驾驶员狠狠地叫：“为什么打人！”他瞪了我一眼，没有讲话，开起车走了。大概看见“警卫员”正抱着枪坐在我身边，还以为我是个什么大人物